

经济学家

学术顾问:(按姓氏拼音排序)

巴曙松 蔡继明 陈东琪 陈栋生 程恩富
迟福林 戴国晨 范恒山 樊纲 高尚全
顾海兵 谷书堂 贺茂之 洪银兴 黄范章
贾康 江春泽 金碚 李成勋 李江帆
李李文 李维安 刘诗白 刘伟 刘涛雄
茅于軾 任玉岭 宋洪远 宋守信 宋养琰
谭崇台 王东京 卫兴华 魏杰 吴澄
徐长友 晏智杰 杨家庆 杨高先 张曙光
张晓山 张卓元 赵人伟 郑新立 朱铁臻
周叔莲 周天勇 邹东涛

学术支持:
清华大学新经济与新产业研究中心
中央财经大学中国改革和发展研究院
总顾问:成思危(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高级顾问:张文台(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一届副主任)
编委:管益忻 陈宇 黄文夫 赵红 李千 吴明伏 白卫星
编委会主任:管益忻
副主任:陈宇
主编:管益忻
常务副主编:启文
副主编:白卫星
编辑部副主任:刘立华
主编助理:何超

第97期(总第210期) 2015年5月3日 星期日 乙未年三月十五 投稿邮箱:jixzb@163.com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100081 电话:010-62135959 本刊订阅方法:网易“云阅读”搜索“经济学家周报”即可订阅。 本报所刊载文章作者观点,均不代表本报意见

“一带一路”的棋局观

■ 梁国勇 联合国贸发组织投资和企业司经济事务官员

“一带一路”战略在陆上、海上两个方向展现了突围、突进的姿态。然而,面对动荡的国际政经格局,高速崛起、逆势而进的中国难免受到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经济行为也可能受到东道国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



随着近期中国政府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以下简称《愿景》),“一带一路”描绘的图景也越来越清晰。中国外交部、中国商务部、中国发改委共同参与发布《愿景》,表明“一带一路”涉及外交、国际经济、投资和发展规划,是一项目标宏大的国家战略。另外,相关领导小组的人员配备也反映其政策优先级别之高:一端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端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一带一路”横跨亚欧大陆,涉及三大洲数十国,展现了大国外交的纵横捭阖。联通中国国内、国外,沟通开放、改革,贯穿投资、贸易,该政策反映了“走出去”战略的升级,也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战略乃至整体经济发展战略的升级。

然而,对“一带一路”的反应存在国内外的落差,也可以看出不同国家、不同领域人士观点的不同。自2013年推出以来,“一带一路”在国内风生水起,但海外的关注主要还是来自政界、学界、智库的专业人士。但是,随着具体规划落地,相关机构设立,特别是今年“两会”和博鳌论坛的巨大传播效应,情况发生了显著的变化。身处海外的我也感觉到,国际媒体对“一带一路”的报道显著增加,微博传播渠道中的相关内容也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普通民众也开始关注这一问题,例如我近期也接到一位远在新加坡的商界朋友的来电咨询。那么,“一带一路”出招的目的是什么,影响会怎样,对国际政经大局意味着什么呢?

首先,“一带一路”可以将中国在经济领域多年积累的“外势”向“实地”转化。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带来了长期的超高速增长,同时也导致了工业产能和外汇资产“两个过剩”,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方面的“两个经验”也特别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面对保增长的迫切需要,如何拓展海外需求,将资本和产能方面的“外势”向经济增长的“实地”转化,这是“一带一路”推出的现实考量。同时也应看到,中国之所长正是很多低收入国家之所短,这就提供了取长补短、互利共赢的可能,这正是“一带一路”经济逻辑的基础。

其次,“一带一路”可以帮助中国将经济规模上积累的“实地”向国际经济秩序的“外势”转化。实际上,基于其现有经济总量、贸易规模、外汇储备,以及不断增长的海外投资和发展融资,中国完全可以在推动全球化进程和完善世界经济治理体系中有更大的作为,而“一带一路”战略的实施将在这方面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一带一路”离不开国际发展融资的配套,而亚投行等多边机构的设立将弥补中国所擅长的双边渠道的不足,特别是有利于应对后者所面临的一些外部挑战。具体出资只占外汇储备的极小部分,但中国能从中获得的各方面收益则是不可估量的。

再次,“一带一路”也蕴含着从经济“实地”到政治“外势”转换的意味。该战略所推动的“更大范围、更高水平、更深层次”的区域合作将有利于加强政治互信,维护地区安全。而更深入地解读其政治逻辑,需要更好地理解“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2015年的博鳌论坛主题为“亚洲新未来:迈向命运共同体”,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主旨演讲也围绕这个

主题展开。很明显,现有各个区域一体化和其他合作机制都是迈向“命运共同体”的途径;而“一带一路”则是重要的助推器,其核心在于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

的确,“一带一路”的政、经维度是密不可分的:这首先表现在经济对政治的“作用力”,但政治对经济的“反作用力”也不可低估。“一带一路”战略在陆上、海上两个方向展现了突围、突进的姿态。然而,面对动荡的国际政经格局,高速崛起、逆势而进的中国难免受到影响,中国企业的海外经济行为也可能受到东道国政治环境和地缘政治因素的干扰。项目层面,这主要反映在准入阶段的政治阻力和投资运营阶段的政治风险,特别是对某些具有敏感性的基础设施领域而言。可以预见,因为“一带一路”涉及范围之广阔,目标之宏大,其面临的各方面挑战也将是空前的。

从“接受规则”到“制定规则”

棋类游戏的竞争都是在既定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现实世界的竞争却可能涉及规则层面的博弈,特别是在“高手”之间。随着越过中等收入门槛,中国发展的棋局已过中盘。不可否认,过去30年中国的高速崛起是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下实现的,但这一秩序自身问题不少,对中国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开始降低——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棋类游戏的竞争都是在既定规则的基础上进行的,但现实世界的竞争却可能涉及规则层面的博弈,特别是在“高手”之间。随着越过中等收入门槛,中国发展的棋局已过中盘。不可否认,过去30年中国的高速崛起是在西方主导的经济秩序下实现的,但这一秩序自身问题不少,对中国发展的支撑作用也开始降低——特别是在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后。

“外势”和“实地”的相互转换

在传统的围棋战略思想中,“外势”与“实地”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地”的累积决定胜负,而“势”却可以转化为“地”并对最终胜负产生决定性影响。因此,弈者须在两者之间保持平衡,必要时又需要在两者间进行转换。从这个角度看,“一带一路”的推出如同围棋中盘的必胜手筋,一旦落子,其影响将是深远的。

首先,“一带一路”可以将中国在经济领域多年积累的“外势”向“实地”转化。中国独特的发展模式带来了长期的超高速增长,同时也导致了工业产能和外汇资产“两个过剩”,而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和制造业发展方面的“两个经验”也特别值得其他发展中国家借鉴。面对保增长的迫切需要,如何拓展海外

中国企业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防止商标遭恶意抢注,是“一带一路”政策中常被外界忽略的,但这又是较迫切需要解决的环节。

“一带一路”须注重保护中国企业知识产权

■ 梁海明 香港经济学者、盘古智库学术委员

在“一带一路”战略部署下,中国企业加速“走出去”已是大势所趋。企业要“走出去”,除了“思想先行”、“粮草先行”,做好前期规划、风险评估和以雄厚财力作为后盾之外,还需要有“知识产权先行”的意识。在保护知识产权的框架下,建立更加完善的商标战略实施机制,提防中国品牌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受到侵犯。

中国企业如何加强知识产权保护意识,防止商标遭恶意抢注,是“一带一路”政策中常被外界忽略的,但这又是较迫切需要解决的环节。

数据显示,中国企业过去在海外投资过程中,每年都有数以百计的商标遭国外企业抢注而失去商标经营的自主权,例如“飞鸽牌”自行车商标被印度尼西亚抢注,“海信”在德国被抢注,联想因Legend在很多国家被注册要改用“Lenovo”等。

众多中国企业品牌商标遭外国抢注,固然是因为中国企业和产品在国外的声名鹊起,关注度越来越高。似乎可以用法国名牌“Chanel”始创人CoCo Chanel的名言“被人仿造是一场灾难,没人仿造是更大的灾难”来形容Q式地安慰自己。但在现实中,那些被外国抢注的商标,中国企业在无论是要通过法律手段向外国企业赎回这些商标,还是另起炉灶开张新设商标,经济成本和时间成本都非常昂贵,这也为中国的企业“走出去”带来不少障碍。

中国企业商标被抢注的原因很多,在用一只手指指责外国企业恶意抢注的同时,另外四只手指需要指向自己,深入检讨被恶意抢注的原因。主要原因有以下四点:

一是,企业缺乏长远规划,对知识产权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常常等到自身进出口业务形成一定规模才想到海外注册,却可能为时已晚。二是,企业对投资所在国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了解不足,缺乏品牌商标的防御思维,在部分商标法不健全的国家,的确常常发生商标原本所有人无奈放弃品牌的案件,或是至少要付出高额的经济补偿。三是,企业常常过多考虑知识产权保护的费用成本,由于海外商标保护、维护等费用较高,增加中国企业的负担,导致不少企业放弃商标保护,而且在商标遭外国企业抢注后维权意识不强,助长了抢注的坏风气。四是,目前在国内企业中,拥有专门知识产权保护队伍的企业为数甚微,企业制定品牌商标保护战略时,缺乏知识产权人才,而且也缺乏官方相关的数据和专业指引,因为后知后觉导致未能抢占先机、提前部署品牌商标保护程序。

如今在“一带一路”的战略下,随着更多中国企业“走出去”,知识产权领域的争夺,已逐渐成为中国企业布局全球,直面全球商业竞争的主战场之一。在前车之鉴下,企业更须具有强烈的知识产权保护意识,不光是中国企业,还包括中国政府,应当更加注重在以下几处发力。

对中国政府而言,政府一方面可考虑从强化知识产权人才培养、储备,加强对品牌商标代理机构的资格认证、诚信机制建设及规范管理,以及增强培训机制等方面着手,开展前瞻性规划,组建系统的、完善的品牌商标服务专业队伍,为到海外投资的中国企业商标抢注问题保驾护航。



外注册商标达到一定数量的中国企业提供资金补助,解决注册费用高昂问题。与此同时,政府应进一步引导品牌商标行业组织、协会的建设,加强发挥他们的“自我”(自我服务、自我管理、自我教育)作用,为“走出去”的中国企业提供多一层保护网。

此外,政府应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商标领域的合作备忘录,通过这一政府之间的沟通平台,协助遭抢注商标的中国企业,能在相关国家主管部门的支持和配合下得到妥善解决。

最后,政府也应考虑设立对知识产权、商标保护不力的国家黑名单,供中国企业参考。与此同时,政府可通过每个季度发布有关哪些国家对品牌商标侵权情况比较严重,中国企业在哪些国家需经常申请注册保护,同一行业在哪些国家已有注册等最新信息,以及提供各主要国家企业商标注册程序、商标注册数量,侵权诉讼数量和企业维权平均成本等信息,让中国企业“走出去”之前,可掌握

显然,对世界和中国经济而言,全球化的“列车”需要新的动力源,世界经济治理的“轨道”也亟待完善。

全球经济治理机制涉及贸易投资、货币金融和发展融资等多个领域,其具体改革可以是存量,也可以是增量,既反映在规则上,又反映在机构上——而机构又往往是规则的制定者和维护者。通过倡导新机构、引导新议程、影响新规则,中国在国际经济治理中的角色正在发生从“规则接受者”到“规则制定者”的转变。

国际贸易和投资方面,最近几年中国开始在双边、区域、诸边层面明显发力,积极介入和推动相关的自由化进程;在去年11月的APEC峰会上,在中国的大力推动下“北京路线图”得以通过,使得亚太自贸区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终极目标”。金融方面,以货币资金池为主要形式的区域性金融安全机制仍有巨大的完善空间,而最为重要的进展是在发展融资领域。通过倡导设立亚投行、金砖开发银行等机构,中国开始在全球经济治理结构调整过程中发挥主导作用。特别是亚投行筹建过程展现了精彩的全球经济外交博弈;50多个国家(特别是英法德等西方大国)的参与使亚投行显示出成为“第二世行”的潜力。很明显,在存量改革受阻的情况下,增量改革已经成为难以阻挡的潮流,而亚投行仅仅是一个开始。

展望未来,“一带一路”的实施将对贸易、投资及相关领域的国际规则产生不可忽视的影响。例如,面对形形色色的政治风险,中国在保护海外商业利益方面如何构建一个稳定、透明、有效的制度架构?这既需要借鉴国际经验,又需要制度创新;这意味着现有中国国内立法和国际协定体系的加强,后者则涉及协定数量的增长、内容的完善和规则质量的提高。另外,“一带一路”相关的微观主体很多都是“国家队”成员,其“走出去”加速可能面临国际规则的挑战,包括所谓“竞争中性”问题和出口信贷规则等。

可以预见,在内部推力和外部阻力的相互作用下,“一带一路”将有助于相关领域新规则的形成。最终,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运营过程中可望面临一个更加稳定和可预期的制度环境,但官方层面围绕相关规则的具体谈判过程及结果则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平等参与和共同协商将是新规则产生的基础。(下转02版)



中国社会福利如何提供与分配?

■ 邹至庄 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经济学教授

我在前一篇文章《市场经济所得如何分配?》中,讨论市场经济的发展怎样会影响所得分配。本文先回顾中国的市场经济和社会福利发展的历史,再讨论政府对社会福利的权责。

自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来,政府对社会福利的供应可分三个时期:计划经济时期、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和市场经济成熟后的时期。在计划经济时期社会福利都是由政府或集体供应,在农村的各种社会福利是由公社供应如医疗、职业与养老等。在城市内则由国营企业保证职工固定的工作,供给他们医疗服务和退休后的生活费。

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使农民富有起来。但是随着公社的组织解散了,赤脚医生从事私人营业,农民失去了医疗服务和老年的生活保障。有人说中国经济体制改革后人民生活最大的损失是农民失去医疗的供应。城市内的国营企业获得自主权后,工人的铁饭碗被打破,有些工人失业,需要自己去找工作。

市场经济开始建立后约20年,中国政府一方面深化经济改革,在1998年建立了国有企业的股份制,另一方面开始建立重要的社会福利项目,包括1997年的企业职工养老保险,1997年公布的农村医疗制度和1998年企业职工的医疗保险等。在2009年,中国政府计划扩大医疗保险的范围,增加保险的人数到9亿人,同时增加给予每人保险费到120元。

2015年1月,中国政府公布了全国居民养老金的政策。针对社会福利的需要,保证老人消费的水平。基于现有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和城镇居民社会养老保险,建立一个统一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在制度模式、筹资方式、待遇支付等方面与合并前的养老保险制度保持一致。资金来源包括个人缴、集体助、政府补三方面。经费方面,中央财政按基础养老金标准,对中西部地区给予全额补助,对东部地区给予50%的补助。地方政府为缴费困难群体代缴部分或全部最低标准的养老保险费,更鼓励公益慈善等社会组织为个人缴费提供资助。

建立社会福利有三个相关的重要问题:首先,谁负责推行福利工作,其次如何决定福利范围,最后如何筹支付福利费用。第一,在中国内地和香港的传统社会,医疗、养老和失业的费用和双关的保险经费大部分由个人和家庭负担。如果政府决定承担这些社会福利,也应让私营企业同时参与,以增加供应的竞争与效率。各种社会福利可由政府与私营企业同时供应,以扩大福利的范围和提高福利的质量。

其次,关于福利的范围,如果福利是由私营企业供应的,福利的种类和价格便会像其他的消费品由市场决定。如果是由政府供应的,政府在决定福利范围时可用各种方式征求人民的意见,还应让私营企业参加供应以获知社会的需要。

最后,如果社会福利是由私营企业供应的,所需的费用便是福利的价值,有如一般货物的价值,由市场决定。如果是由政府供应的,政府同时需要决定福利的范围和支付福利费用的方案,这是政府决定收支问题之一。还有很多其他项目也需要政府决定它的供应与经费来源,包括基础设施。有些基础设施,政府也可以让私营企业承包。例如从香港到广州的第一条高速公路是由私营企业建筑的。

上面讨论政府制定的各种社会福利政策,在实现之中也要留意制定的政策常有实施的困难,不能假定所有制定的社会福利政策都能实现。